

【新闻与传播】

建设性新闻视域下环境传播的话语转向*

漆亚林 刘静静 陈淑敏

摘要:建设性新闻因其开放性与包容性为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转向带来想象空间。建设性新闻为中国环境传播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话语重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和阐释视角。环境传播基于保护生态和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基因与建设性新闻倡导的正向引领、解决问题的责任理念具有内在的逻辑勾连。建设性新闻理念为环境话语的建设性构序提供了操作进路,即促进环境传播主体的观念之变、环境话语修辞策略的调性之变和面向未来的环境传播的社会动员力之变。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环境传播;话语转向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7-0158-08

环境问题是世界各国十分关注的议题,生态保护亦是全球化发展战略。智能媒体赋权机制打破了环境传播的话语秩序,环境场域的话语冲突日益频繁,产生的社会矛盾逐渐增多。如何通过重塑环境传播的话语生产机制和引导策略化解环境问题和话语冲突带来的社会风险,是新时代环境传播与社会治理的一个紧迫课题。建设性新闻的理论与实践为构建环境传播的新范式提供了巨大想象空间。

一、研究缘起与理论资源

环境传播和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传播理念和话语实践,对建构社会现实和公众认知有重要的作用。中外学者对环境传播和建设性新闻的核心概念、理论演进、实践图景及其中国化特征与路向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学术智慧。

1. 环境传播的研究进路

20世纪60年代,环境传播开始进入学者研究视野。吉列尔雷和舍恩菲尔德率先把环境传播定义

为“围绕环境、环境管理、环境议题方面的文字、语言或视觉信息,对其进行策划、生产、交流或研究的过程与实践”^①。环境传播一直存在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两个主要研究方向:现实主义研究聚焦环境核心问题、环境议程设置、环境行动实践以及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建构主义研究主要考察环境话语表征、生产机制以及内构的权力关系。随着全球环境政治影响力的扩散以及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基于风险社会与危机视野的环境传播考察在我国学术界勃兴。学者们从概念阐释、议题内容、发展演进的时空脉络构建环境传播的知识图谱与焦点命题,经历了从国外引进到本土化探索的研究进路。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环境政治学译丛”具有国内环境传播理论研究的奠基作用。刘涛将环境传播主要研究对象归纳为话语与权力、修辞与叙述、媒介与环境新闻等九大研究领域,勾勒出环境传播研究的基础性架构。^②我国学术界对环境传播的研究经历了从“环境新闻传播”“环保传播”“环境伦理及风

收稿日期:2020-12-1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环境传播场域冲突机制与舆论引导策略研究”(15YJAZH056);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重大项目“国家网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与实现路径研究”(02011903820134)。

作者简介:漆亚林,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创意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089)。

刘静静,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北京 100089)。

险传播”到“生态治理与绿色传播”的沿革。随着经济发展与环境正义的矛盾日益显性,环境行政理性主义逐渐成为主导性话语,中国特色环境传播话语研究与学术体系构建日益受到学者重视。中国特色环境传播学成为一种正在进行的可能。^③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中国特色环境话语的提出,突破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的现代性哲学局限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④“美丽中国”“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国家逻辑成为新时代中国环境政治的核心,也是环境传播的中国话语、中国经验、中国范式的逻辑基础。

环境话语成为环境传播研究的持续性主题,作为意义表征的环境传播修辞机制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如郭小平通过对环境传播中“委婉语”修辞的批判性解读,揭示了环境话语掩饰与弱化生态风险的后果、“洗绿”商业主义的行为、美化消费主义倾向、规避与转移风险责任的形塑力量。^⑤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发展,环境传播建构的另类绿色空间及其情感动员机制引发了环境传播的话语失序,环境抗争与邻避运动驱动环境传播场域反话语空间的生成,基于技术哲学、视觉修辞、智能传播的新型文本构造实践的研究日益活跃。经由社交媒体参与的环境传播呈现出日常化与时尚化的特点。^⑥

从环境传播研究的学术史考察可以发现,无论是现实主义研究还是建构主义取向,抑或技术环境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传播范式的提出,都以环境信息的呈现来建构和解决环境问题为使命,都体现出环境传播的建设性功能。正如有学者所言,媒介使用能够通过环境知识和环境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间接地影响亲环境行为。^⑦环境传播不仅仅是一场建构人与环境关系的学术之旅,还是一场具身、心智与世界联通与调适的实践运动。

2. 建设性新闻的绿色观点

建设性新闻理论与实践给把“坏消息才是好新闻”理念奉为圭臬的西方新闻界和以正面报道为主的中国新闻界都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⑧作为一种(新闻)哲学和实践的建设性新闻正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发展。^⑨2015年,美国学者凯伦·麦金泰尔和丹麦学者凯瑟琳·吉尔登斯特德正式提出“建设性新闻”的概念,认为“建设性新闻将积极心理学技术应用到新闻工作中,以努力创造更吸引人、更有成效的故事,从而改善个人和社会的福祉”,包括和平新

闻、方案新闻、修复新闻、公民新闻等具体方式。积极的情绪和解决方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这与建设性新闻报道改善个人和社会福祉的总体目标相一致。^⑩建设性新闻被视为是西方新闻业面临信任危机困境的转型发展路向。这种报道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主流新闻业负面的、基于冲突的内容所导致的公众冷漠和沮丧。^⑪学者们围绕建设性新闻的内涵边界、理论演进和全球实践进行了探索,并从新闻理念、报道样式、新闻实践、辞屏标识等多维度展开研究。建设性新闻似乎更契合中国文化语境与制度规约,因而易于获得主导文化认同。学者们在辨析建设性新闻与公共新闻、公民新闻、解困新闻等多种新闻形式异同的基础上,反思建设性新闻与西方传统新闻价值观之间的关系。^⑫

建设性新闻作为一个“伞式”理论,边界模糊,辐射宽泛。^⑬正因为此,它允许不同的研究者反思新闻业的核心价值及其对社会的益处^⑭,在关乎人类可持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相关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理论界对重大卫生公共事件、环境新闻、气候报道等方面的探索开启了从建设性角度研究环境传播的路向。从整体上来看,建设性新闻视域下的气候变化、垃圾分类报道等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但存在较大的深化空间。面对人类可持续发展这一重大议题,气候变化、垃圾分类、空气污染、水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都与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密切相关。那么,媒体如何报道环境问题、如何在环境传播中引入建设性新闻理念,既是建设性新闻研究亟待开垦的学术领地,也是环境传播有待深化研究的一个关照视角。

二、环境传播的建设性逻辑

在后真相时代,新技术驱动环境传播场域的权利构型发生巨大变化,社会风险亦随之增加。绿色话语虽然多元,但是环境传播基于保护生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使命与建设性新闻倡导正向引领、解决问题的责任理念一脉相承,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逻辑基础。

1. 从危机剧目到人文关照:环境传播中的建设性基因

菲德拉·佩祖鲁和罗伯特·考克斯将环境传播定义为“一套命名、塑造、定位和协商人类与非人类系统、元素和物种之间生态关系的实用主义表达方

式和建构主义表达方式”^⑮。其实用功能在于通过“语言和非语言形式的互动交流,达到告知、要求、承诺、请求、教育、体系、说服、拒绝等目的,从而促进环境观念的传播和环境问题的解决”;其建构功能在于“帮助我们唤起和培养对于环境问题的感知、定义以及深入理解”。^⑯在建构环境认知的过程中,媒体的环境传播实践处于核心关键环节。无论是实用主义倾向还是建构主义倾向,环境传播最后的落脚点均在于促进公众对环境问题恶化的洞察、对环境保护组织的功能与作用的理解、对环境话语的推动和对环境保护行动的支持,培养公众环境保护的价值观与行动力,从而在获得公众对环境保理解支持的同时,呼吁公众参与解决环境问题的行动,建构人类与环境和谐的动态关系。这与建设性新闻旨在促进受众理解、提出可行方案、积极解决现实问题的报道取向不谋而合。作为一种新闻理念与价值取向的建设性新闻,与作为媒体重要议程设置的环境传播,它们在新闻实践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坐标上具有内在逻辑勾连。

从历时性来看,建设性新闻与环境传播均是在基于现实困境的“危机”视野下产生,发展脉络朝着促进传播活动“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转变。西方媒体过分追求“人咬狗”式的负面、冲突、怪异、戏剧性的报道模式,造成公众同情疲劳、同理心匮乏与新闻回避,导致媒体公信力下降。作为媒体应对结构性危机以突破发展困境的实践转向,建设性新闻强调新闻报道框架实现从冲突到调和的蜕变,报道调性从“粉碎美好”到发现“希望之光”。在新闻报道中不仅要揭露问题、分析问题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和参与式行动指南,以激发公众积极乐观向上的情绪,让他们看到解决困境的蓝图与力量。在这种新闻理念与报道策略下,正面和负面新闻都可以产生,只要它们不会给读者留下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⑰这种新兴的新闻报道理念与样式超越危机报道框架和剧目编排,追求危机或灾难应对与重建时的人文框架与协同策略,促进人类社会向真、向善、向美的方向发展。从全球环境传播的理论、环保运动的发展来看,哈丁的公地悲剧与罗马俱乐部研究项目《增长的极限》发出的警世预言吹响了环境主义运动的号角,荒野保护运动、生态保育主义、环境正义运动、绿色激进主义、可持续发展、生态中心主义、现代环境主义等环境行动或者话语范

式不断变迁,给环境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供给和观察视角。环境风险议题的大量报道与传播,在提高公众保护环境意识的同时,也涵化影响公众对外界环境风险的感知。“危机是环境传播的一个重要动机,但其他驱动因素也很重要,包括那些鼓舞人心的、治愈的、有所获益的或变革性的空间和对话”,“只给悲伤和愤世嫉俗留出空间会让人感到压抑”,由此环境传播不仅是一门关于“危机”的学科(a crisis discipline),更是一门“关怀”的学科(a care discipline)。^⑱从媒体的新闻实践来看,媒体在报道环境危机以满足公众生存需要的同时,还要超越危机与灾难报道框架朝着生命正义、社区重建、人心恢复、人类美好的目标前行,这与建设性新闻的逻辑起点与价值指向异曲同工,即环境传播始终以正向的建设性功能为导向,以着力解决环境问题、建构天人合一的生命观和价值观为旨归。

从共时性来看,以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命运共生的环境传播与承担社会责任与文化使命的建设性新闻,二者的理论虽然滥觞于西方,但是新闻观念与社会实践却具有全球性和共域性的特点。各国或各地区在历史中都遇到过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矛盾,解决环境问题成为现实需要和国家治理的重点。环境危机是世界性难题,也是媒体议程设置和重点报道的主题之一。从环境传播的中国实践来看,解决环境危机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也有来自对我国环境问题的自省产生的动力。1997年,世界银行在《2020 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与挑战》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中国的空气和水污染的状况,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已属世界最严重之列。^⑲2005年,“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随后,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写进报告中;党的十八大提出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环境;2013—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的讲话、论述、批示超过60余次;等等。中国政府以中国特色的绿色政治积极参与全球性环境政治与环境传播,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呈现在国际舞台上。同时,也体现出行政理性主义环境话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特色道路。

我国媒体为构建人与生态环境的健康和谐关系发挥了建设性功能,建设性新闻的勃兴为我国环境

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的转向带来丰富的想象空间。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都市类媒体或者民生节目为了拓展市场,重视舆论监督功能,采用冲突性、戏剧性、归因性、追责性框架建构文本内容,有利于普及环境生态知识、助推环境正义启蒙、促进环境问题解决,但是报道中凸显问题性与遮蔽恢复性的叙事策略加大了社群之间的裂痕和群体性的对抗。在公共新闻、参与式新闻中,技术赋权带来的围观政治效应使得诸多环境公共事件以网络民意的走向作为环境抗争剧目的结局,群体极化与后真相加大了环境传播的社会风险和治理成本。西方以问题解决为导向,寻求向上的力量和解困方案的“好新闻”运动,在我国的新闻实践中亦形成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滋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核心、以社会责任与功能导向为目标的协同主义范式。^⑳新闻报道要宣传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传播正能量、维护社会稳定,并将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全面性原则与正确的舆论导向相结合,将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相统一,这既是中国建设性新闻的重要特征,也是环境传播的目标。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增长与国家复兴乃至世界命运紧密相连。有学者认为,在中国与世界已经结为一体的语境下,克服种种环境危机的路径只能是生态社会主义。^㉑党的十九大提出,把“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作为生态建设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生态环保任重而道远,是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挑战之一,并将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之一。生态危机、环境风险等环境类议题关乎公共利益、人民福祉,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唇齿相依。在后新闻时代,作为环境世界建构的主要实践方式之一的环境传播呈现出以下特征:社会公益性与市场商业性的两难性,政府、媒体、公众等多元主体、多元话语空间的复杂性,短期利益与社会长远发展的关联性,等等。涵盖方案性、未来导向性、包容性与多样性、赋权于民、解释新闻并提供语境、共同创作等六大要素的建设性新闻^㉒,在致力于新时期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的环境传播实践中具有方向性意义,即环境传播要以环境主流价值观为核心,服务于公共利益,增强媒体环境传播的社会责任与

文化使命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和谐与统一;通过包容性、多样性以及赋权于民的守正创新来为移动场景中环境传播的多元话语提供公共讨论的空间;重视未来为导向,则要求环境传播要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人类谋长远福祉。

2. 媒介化转向:环境话语的建设性构序

媒介几乎对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有影响,在许多现代民主国家,媒介基础设施使得政治、经济、文化成为可能。^㉓媒介融入其他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的运作中,同时其自身也相应成为社会制度,因此社会互动越来越通过媒介得以实现,即“媒介化”转向。^㉔新技术驱动媒介话语祛序,深刻改变了舆论生态和社会构型。就环境传播来看,日益环境化的媒介在我国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是简单告知公众环境信息,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强化公众的环境风险认知,促成公众的环境抗争运动,即媒体已介入环境问题的产生、发展以及解决的全过程。中国的环境抗争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沿着集体沉默与隐忍(1949—1972年)、环境抗争意识启蒙与生成(1972—1992年)、环境抗争兴起与扩散(1992—2003年)、环境抗争行动多元化和媒介化(2003年至今)的方向发展。在环境抗争事件中,抗争框架并非由抗争者或媒体独立建构,而是由抗争者与媒体、公众在抗争过程中不断互动而成。^㉕但是,媒体对环境事件的框架化策略,尤其是冲突性框架对公众的环境风险认知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厦门PX事件中,异地媒体的不平衡与戏剧化表征以及网民的污名化与语境化,片面强调项目的危害而忽视了项目发生爆炸或泄露的概率,成为环境风险放大的重要原因。^㉖厦门海沧业主反对事件、上海业主反对磁悬浮列车项目事件、广州番禺业主反对垃圾焚烧炉事件、北京六里屯业主反对垃圾焚烧厂事件等多起环境事件中,技术赋权下的公众通过媒体搭建的平台进行环境维权,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一定程度上倒逼环境问题的解决。但是,它们同时也会给国家或者地方的发展战略带来困顿,给社会增加不稳定因素和治理难度。在环境风险与邻避心理的纠缠中,公民无力改变现实的沮丧和愤世嫉俗情绪,使得他们对参与环境保护运动缺乏积极性,更愿意采取抗争形式来应对严峻的环境危机。从全球环境话语进路来看,尽管环境危机严峻,但真正的危机

在于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在解决公共生活各个层面问题上变得更加激进。^{②7}环境公共事件易于加剧塔西佗陷阱,主流话语空间与公众“反话语”空间的对峙,公众与政府、专家、企业等多元主体间矛盾的激化等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带来的生态危机,更是一场值得警示的社会性危机。

作为“风险感知器”“社会减压阀”的新闻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在环境传播中是否建构了一套建设性的话语体系和运行机制关系到媒介功能主义的倾向与异化,也关系到社会风险的变数与环境治理的成效。如何回应或解决如下问题是环境传播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主要面向:其一,是否从理念上确认社会责任之于新闻价值的重要地位,意义媒体之于媒介功能的转向;其二,从传播内容上是否设置了建设性的环境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之道而非强化冲突性框架,放大环境风险;其三,从传播语态上是否通过融合 UGC、PGC、MGC 等内容池,打造多模态话语形态,讲好环境故事以增强环境传播的传播力和引导力;其四,从传播效果上是否发挥沟通协商作用弥合公众与政府、企业之间的裂痕,是否在环境冲突中发挥了正向作用;其五,从结构优化上是否基于流程再造、人才孵化、技术嵌入、评价体系等运行机制完善环境传播内容生产的保障体系等。建设性新闻的理念旨在平衡偏见,期望通过用希望取代犬儒主义、用公民参与取代冷漠以及通过减少两极分化的争论来提高社会福祉。^{②8}建设性新闻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环境传播发挥正向社会整合功能的话语重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和阐释视角。

三、环境传播话语实践的关键性操作

建设性新闻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是一个包含多种概念和元素的理论群。^{②9}因其开放性与包容性赋予该理念具有解释各种媒体报道议题的生命力,加之环境传播本身具有的建设性基因与正向功能导向,即“使决策者、社区、企业、教育工作者和公民团体能够以适合人类和其他生物福祉的方式对环境压力信号做出反应”^{③0}。建设性新闻为后新闻时代环境传播在信息扩散、意义传递、价值引领、构建共识、促进行动等方面提供了新思路、新路径与新方法。

1. 建构与介入:环境传播主体的观念之变

理论界对于环境报道的社会动员与客观性之间的论争由来已久,“当前环境报道产生了信任危机,

原因是它经常出现的鲜明导向,与新闻客观性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③1}。孙玮认为,当前中国环境报道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是环保主义的宣传性太强冲击客观性导致的信任危机,而是媒介全面介入环境问题的能力太弱,表现为环保运动的社会动员力度不够”。^{③2}传统新闻价值观倡导新闻从业者成为事实的客观呈现者、公共空间的监督者,以中立旁观者姿态成为“麦田里的守望者”,新闻报道不干预、不介入新闻故事的发展。专业质性需要新闻保持独立性和客观性,这仍然是新闻传播的核心特征。但是,新闻在追求真实复写生活的同时,一则难免会出现态度冷漠的问题,缺乏温度和人文价值;二则缺乏社会动员力量的环境传播难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社会应对环境问题的迫切需要。反复出现的环境问题不痛不痒、惯习式地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是否有效传达给受众,是否促进了问题的解决无从知晓,如此循环往复,加剧环境传播的“内卷化”,也给后真相时代的网络场域留下巨大的“反话语空间”。

建设性新闻要求记者承认新闻是被建构的,并提倡记者意识到他们所建构的新闻故事的影响力。^{③3}基于此,新闻从业者在环境传播实践中应转变职业观念,从置身事外到积极参与,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实现从环境信息告知者角色向价值引领者、组织协调者、公共问题参与者等多元复合角色的转变,在媒介化社会语境中以主导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引领环境传播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效果。这要求新闻记者包括参与式新闻的生产者不仅要揭露环境问题、揭示风险、分析原因,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问题曝光与责任追问,提出可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路线图,从行动主义角度解决环境问题的积弊。例如,《新京报》的环境新闻以问题为导向,长期着力建设中国绿色公共领域,推动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解决环境危机。2014 年的报道《沙漠之殇:腾格里沙漠腹地现巨型排污池》,揭开腾格里沙漠污染环境腐败案;2015 年的调查报告《六里屯垃圾填埋场驶出假洒水车偷排污水》,引发环保部门和司法机关的关注,最终追究了相关人员法律责任;2019 年的报道《山东鄒城复垦地成固废“地下”填埋场》,引发当地相关部门关注。

传播主体的环保理念从“浅绿”走向“深绿”,也是环境传播对新时代媒体建设性功能的回应与实践。在环境新闻学中,“浅绿色”环境观是指就环境

论环境,仅仅是对旧的工业文明的调整或补充,较少探究人类发展方式是否存在问题;而“深绿色”环境观是指洞察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从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中思考环境问题的发生和防止机制,更崇尚人类文明的创新与变革。^⑳中国行政理性主义话语已将环境保护置换成生态文明建设,为环境传播主体在内容深度、广度和温度上的拓展提出了新要求,与现代环境主义的目标诉求相契合。但是,网络空间具有低密度的文化土层与裂变性的特征,环境UGC的社会动员力量越大,越容易对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副作用,这在“邻避运动”中尤为明显。因此,UGC主体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在新媒体赋能中彰显科技向善、向上的力量。

2. 积极与希望:环境话语修辞策略的调性之变

约翰·德赖泽克认为,话语是一种理解世界的共享方式,话语建构了意义与关系,环境话语是制约我们界定、解释和应对环境事务的方式。^㉑罗伯特·考克斯从修辞的角度阐释了话语是如何通过辞屏和命名来争夺环境的意义。^㉒话语主体通过环境事实的选择、凸显、指代、比喻、隐喻、体裁、框架等修辞策略来建构我们理解环境的思维方式,从而实现劝服的功能。“委婉语”“结合”“视觉化”“具身性”等成为环境话语修辞的重要实践方式。不同环境主体往往会发起有关合法性争夺的修辞革命,即通过对语言的象征交换与委婉表达来实现自身观念、行为和价值的合法化表征。^㉓环境问题解决、生存主义、可持续性和绿色激进主义四种环境话语范式^㉔,既是环境修辞实践的表征,也是环境意义争夺的结果。

我国的环境传播呈现一个多重话语与行动交流的,存在于宏观、中观、微观多层面的复杂、混合、多面、虚拟、变动、新兴的绿色公共文化空间。^㉕在环境公共事件传播中,夸大、戏谑、调侃、扯淡等话语策略影响了人们的环境认知。例如,在厦门PX事件中,《中国经营报》曾使用“高致癌物”“极高致畸率”“特别重大的安全隐患”等话语,夸大、凸显了PX项目的危害性。^㉖PX项目的“剧毒性”命名和“一颗原子弹”的比喻修辞建构了公众的风险认知,妖魔化的传播框架给公众带来极大的恐慌。公众则借助诸多网络空间发布相关信息,采用了环境正义与维护权利等修辞策略,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最后政府将该项目搬离厦门。在反对焚烧垃圾场等邻避冲突事件中,媒体与平台采用非对策和非平衡的修辞

策略,对邻避设施的长远效益、通过科学管理与技术可有效降低负面影响等正反两面的报道不够充分。环境知识鸿沟与媒介风险的调性偏向,会导致公众的认知偏差,使公众对有效防护措施缺乏全面了解,加剧风险恐慌症,产生负面情绪和非理性行为。又如,美国精英和大众媒体在建构全球变暖议题时强调使用“世界末日”的隐喻修辞与命名策略,这减轻了人类活动造成全球变暖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类在应对全球变暖困境时的能动性。^㉗纵观媒体在环境传播中采用的话语修辞策略,它们不仅会造成公众害怕、恐慌、焦虑等负面情绪,还可能降低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与保护的信任度。

建设性新闻引进积极心理学,在环境传播实践中采用积极、正面和充满希望的话语调性和修辞策略,融入建设性新闻理念,找到问题的症结,提出解决的方案,给相关利益人和受众“阳光总在风雨后”的冀盼。实验证明,相比于非建设性框架的报道,采用建设性框架的新闻报道会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上影响受众的态度,使其减少消极看法,积极学习并效仿践行有效方案,从而推动社会进步。^㉘例如,有媒体在垃圾焚烧项目等邻避事件的报道中,详细向公众介绍垃圾焚烧、净化、填埋等步骤,将降低风险与增强防护的各项技术保护和管理措施向公众“透明化”,以增强公众的理解,同时降低公众的恐慌情绪。2009年,央视《新闻1+1》栏目采用参与式、协商式话语策略探讨广州番禺建垃圾焚烧厂遭反对的深刻原因,并提出立项前“民意是黄金”“垃圾分类”等具有建设性的方案,对全国性垃圾项目甚至环境事件的处理均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采用视觉修辞、多模态、超文本话语讲好环境故事,助推环保公益活动也是环境传播建设性功能的重要体现。毋庸置疑,当下视觉化已经成为文化主因,视觉文化逐渐渗透进社会各个领域。美国学者迈克尔认为,“视觉文化是指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视觉文化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一种转换。^㉙图片、电影、电视、动漫、短视频、直播、H5、VR/AR/MR等视觉化产品已经成为主导性传播形态。环境的视觉修辞具有重要的说服与建构功能。罗伯特·考克斯认为,环境的视觉修辞会产生两个劝服方式:影响我们的感知和看待

环境的特定方式,建构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看法。^④例如,电影《美人鱼》的视觉叙事建构了绿色浪漫主义和生态现代主义,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3. 行动与参与:环境传播的社会动员力之变

传统新闻对负面的、个性化的事件的关注,以及它对客观性的伪装,关闭了现存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它们是生态破坏的根源)急需的民主辩论的空间。^⑤环境问题关乎每个人利益,通过多元主体协商与沟通、促进行动与参与是环境传播的应有之义。要相信每个人在解决环境问题上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从在日常生活中做出选择到缔结全球条约。^⑥

第一,增强环境传播的议程设置能力。环境传播议程设置亟须建构平衡与融通的议题感知与协商机制。凯伦·麦金泰尔等指出,建设性新闻通过公布消极和积极的事件和问题来更准确地描绘世界,并坚持新闻的核心功能是充当监督机构,向公众传播重要信息,以及准确地描绘世界。^⑦环境传播议题需要平衡正面和负面报道,将生态环境现状全面真实呈现给公众。这是公众得以正确感知环境风险的基础,使公众在理性认识的前提下参与环境行动,而非无动于衷或非理性地抗争。同时,传统媒介与“另类替代性媒体”(新媒介)议题构序的差异(彰显与遮蔽)易于产生“鸡与鸭对话”的传播效果,甚至出现话语冲突与撕裂。因此,环境传播需要建构通约的议题感知与协商机制。

第二,拓展环境传播的主体性力量。环境传播议程设置应以公众为核心,建构政府、媒体、企业、社群、民众为一体的社会动员力量。建设新闻主张“公众导向”,一方面,以人为本,从人的需求出发,关注公众的生存、生产和生活,为公众解惑、解忧与解困;另一方面,注重将公众纳入新闻生产流程,发挥多元主体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长期以来,环境传播主体对彼此核心角色理解的错位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其对对方价值的漠视、忽视甚至不屑,对话前提因此变得脆弱不堪。^⑧因此,环境传播的实践应致力于搭建一个绿色公共话语空间,激活多元主体议程设置的动能和参与绿色公益行动的内驱力,主动承担环境传播的责任角色,充分发挥政府在环境传播与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以及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在环境保护与治理中

的建设性作用。

第三,建构中国特色的环境话语范式。西方环境话语源于新古典经济学支撑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成本不计算环境污染的损失。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环境问题解决、生存主义、可持续性还是绿色激进主义话语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体现。环境友好型社会、美丽中国、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中国特色环境话语的提出,突破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的现代性哲学局限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彰显了中国绿色政治哲学的价值观特质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文化基因。^⑨中国主导性环境话语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基础之上,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环境话语范式。它要承载公共协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舆论引导与环境治理的功能,体现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社会主义特征。

四、余论

建设性新闻与环境传播的核心任务一致,均是通过分享信息、话语构序、促进行动来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传播是象征性媒介,具有实用性和建构性功能,它教育、警示、说服并帮助我们解决环境问题^⑩。但是不同的环境话语会对我们建构不同的环境认知,促成不同的环境行动,具有不同的社会作用。同时,技术主义与商业主义合谋在新媒体场域建构的反话语空间成为环境对抗性话语的栖身之所。环境新闻报道中引入积极心理学,并在议程设置中提出解决的路径,也就成为建设性新闻样式。环境传播建构了健康和谐的生态环境亦即彰显了象征性媒介的建设性功能。

注释

- ①刘涛:《“传播环境”还是“环境传播”?——环境传播的学术起源与意义框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7期。②刘涛:《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1938—2007):话语、权力与政治的解读视角》,《新闻大学》2009年第4期。③张瑜焯、刘儒田:《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特色环境传播学的构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④⑨李玉洁:《以中国为方法的环境传播话语建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4期。⑤郭小平:《环境传播中的风险修辞:“委婉语”的批判性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5期。⑥戴佳、曾繁旭、吴丽蓉:《用社交媒体讲好中国的绿色故事——“地球一小时”活动案例分析》,《对外传播》2015年第11期。⑦周全、汤书昆:《媒介使用与中国公众的亲环境行为:环境

知识与环境风险感知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⑧邵鹏、虞涵、张馨元:《新闻正能量:建设性新闻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⑨Jelle Mast, Roel Coesemans, Martina Temmerman.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Concepts, Practices, and Discourses. *Journalism*, 2019, Vol.20, No.4, pp.492-503。⑩⑪Karen Elizabeth McIntyre.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Emotions and Solution Information in News Stories*.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Mass Communication in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2015。⑫漆亚林、刘静静:《建设性新闻的生成逻辑与现实困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增刊。⑬金苗:《建设性新闻:一个“伞式”理论的建设行动、哲学和价值》,《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⑭⑮Victor Wiard, Mathieu Simonson. "The City is Ours, so Let's Talk About it": Constructing a Citizen Media Initiative in Brussels. *Journalism*, 2019, Vol.20, No.4, pp.617-631。⑯⑰⑱Phaedra C. Pezzullo, Robert Cox.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5th Ed, Sage Publications, 2018, pp.34-35, pp.34-35, p.38, p.24。⑲陈彩棉、康燕雪:《环境友好型公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1页。⑳㉑漆亚林:《建设性新闻的中国范式——基于中国媒体实践路向的考察》,《编辑之友》2020年第3期。㉒赵月枝、范松楠:《环境传播:历史、现实与生态社会主义道路——与传播学者赵月枝教授的对话》,《新闻大学》2015年第1期。㉓Liesbeth Hermans, Cathrine Gyldensted. Elements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Characteristics,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Audience Valuation. *Journalism*, 2018, Vol.20, No.4, pp.535-551。㉔[加]菲利普·N. 霍华德:《卡斯特论媒介》,殷晓蓉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7页。㉕[丹麦]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刘君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1页。㉖付宁:《中国环境抗争事件的媒介逻辑分析——基于2003年—2018年环境抗争事件的多案例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论文,2020年,第25页。㉗邱鸿峰:《环境风险的社会放大与政府传播:再认识厦门PX事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8期。㉘Susan L. Senecah. Impetus, Mission, and Future of the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Division: Are We Still

on Track? Were We Ever?.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2007, Vol.1, No.1, pp.21-33。㉙⑳Karen McIntyre, Cathrine Gyldensted. Positive Psychology a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2018, Vol.12, No.6, pp.662-678。㉚Robert Cox. Nature's "Crisis Disciplines": Doe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Have an Ethical Duty?.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2007, Vol.1, No.1, pp.5-20。㉛张威:《环境报道的宣传色彩与新闻的客观性》,《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0期。㉜孙玮:《转型中国环境报道的功能分析——“新社会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期。㉝郭小平、李晓:《环境议题的“能见度”之变与电视话语建构——以央视〈新闻调查〉(2000—2019)为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㉞⑳[澳]约翰·德赖泽克:《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蔺雪春、郭晨星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0、13—15页。㉟⑳⑳[美]罗伯特·考克斯:《假如自然不沉默: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第3版,纪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5—73、76、21页。㊱刘涛:《接合实践: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探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㊲转引自陈虹、潘玉:《从话语到行动:环境传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新模式》,《新闻记者》2018年第2期。㊳《百名委员紧急提案要求海沧PX项目迁址 厦门百亿化工项目安危争议》,《中国经营报》2007年3月19日。㊴Christina R. Foust, William O'Shannon Murphy. Revealing and Reframing Apocalyptic Tragedy in Global Warming Discourse.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2009, Vol.3, No.2, pp.151-167。㊵Klaus Meier. How Does the Audience Respond to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2018, Vol.12, No.6, pp.764-780。㊶[美]W. J. T. 米歇尔:《图像理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2页。㊷Yves Pepermans, Pieter Maesele. Climate Change Journalism: From Agony to Agonistic Debate. *Desenvolvimento e Meio Ambiente*, 2017, Vol.40, pp.125-140。㊸Karen McIntyre, Cathrine Gyldensted.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An Introduction and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ying Positive Psychology Techniques to News Production. *The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 2017, Vol.4, No.2, pp.20-34。㊹黄河、刘琳琳:《环境议题的传播现状与优化路径——基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比较分析》,《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1期。

责任编辑:沐紫

The Discourse Turn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Qi Yalin Liu Jingjing Chen Shumin

Abstract: Because of its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has brought imagination space to journalistic theory and practice.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provide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an explanatory perspective for the discours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to play the role of social integration. The cultural gene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of ec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logically linked with the idea of positive leading and problem-solving responsibility advocated by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The concept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provides an operational approach to the constructive con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that is, it promotes changes in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subject, changes in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rhetoric strategies, and changes in social mobilization of future-oriented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bstract: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diversion